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12

2013年2月14日

对知青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云南大学 萧宪

中共十八大选出的新一代领导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知青经历。据统计，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当过知青，占31.7%。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七人当过知青，占28%；而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四人当过知青，占57.1%。有分析认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领导人，在治国理政方面会更灵活，兼具务实与开明两种特质，这无疑将会影响未来中国。近一段时间来，已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知青”话题又热了起来。作为当年“上山下乡”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我在农村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对于我来说，重提“知青”这一话题，除了带来怀旧的伤感之外，更多的是引起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思考。

一、昆明十年知青潮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当时称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在全国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幕。¹从1969~1979年的十年时间里,全中国大约有两千万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去到农村(农场)生活和劳动。

这些“知青”绝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生,也有少量知青只是小学毕业,因受“文革”耽误已到了15、16岁,也被安排上山下乡。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知青很少,绝大部分人都是根据当时的政策不得已而“上山下乡”的。如果不去农村,在城里是不可能就业、上学或者入伍的,甚至可能连粮食供应和户口都没有。所以,当时这些城市青年基本是没有选择的,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安排到农村去,只有病残者、独生子女,或者兄弟姐妹中已有多人下乡而父母身边仅剩一人的,才可享受政策照顾留在城里。

当时中国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涉及“知青下乡”。多数家庭至少有一个孩子下乡,还有的家庭里几个孩子都下到了农村。当时全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不过两亿人,两千万“知青”下农村,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去到了乡村。所以,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少有的从城市到乡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下乡知青一般在农村少则二、三年,多则七、八年,都在艰苦的环

¹ 虽然在此之前的1950、1960年代也有少量城市青年(如邢燕子、侯隽、董加耕,昆明的青年垦荒队、“九兄妹”等)出于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理想主义,主动从城市到农村定居生活,但他们人数少、影响小,未像后来这样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境中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文革”期间，许多事情都以“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知青下乡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各地在动员和组织工作完成后，一般都要召开热烈的“欢送知青上山下乡大会”，领导发表讲话，知青代表、家长代表也要讲话，慷慨激昂地表决心。即将下乡的知青们披红戴花，然后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到农村。这类场面通常都很热闹，知青们也很风光，但到了农村之后的艰辛和困难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文革期间，我在云南昆明市上中学，毕业时正好赶上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期。据统计，1969~1979年期间，昆明市共有78570名知青上山下乡。² 这七万多人又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1969~1972年下乡的，这些人主要是去滇西（当时被称为保山“外五县”的潞西、陇川、盈江、梁河、瑞丽等地）的农村插队或者到边疆农场（当时叫“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共有三万余人；第二部分是1973~1979年下乡的，这一部分知青主要是在昆明市的安宁、晋宁、呈贡、富民、官渡、西山等郊县区的农村插队，共有4.6万多人。

1969~1972年从昆明到“外五县”插队的知青主要是按知青毕业的学校进行动员和安置的，而1973~1979年在昆明郊县区插队的知青则是根据家长所在单位进行组织动员和安置的。后来也有人把1969~1972年下乡的那些昆明知青称为“老知青”，把1973~1979年下乡的昆明知青称为“小知青”。

在昆明郊区插队的知青到农村后一般都组成知青集体户，人数从三、五人到一、二十人不等。早期下乡的知青户多被安排在生产队的集

² 以下昆明市知青人数统计资料主要来源于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料，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体公房里，后来下乡的知青多了，便由市县、知青家长所在单位和当地农村（社队）共同建盖知青房。知青们与农民一起劳动，下工后便回集体户生活。也有少数知青因有文化（或被照顾）担任了农村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会计员、农科员等。插队知青一般在农村干几年后，便可通过招工、招生、参军等方式离开农村。同时，每年又有新的知青不断从城里下到农村来。这样，插队知青们来的来，走的走，最后没有形成农场知青那样集中返城的“大潮”。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就进入了尾声，到1979年便最终停止了。据有关资料统计，1971~1980年，在昆明郊县区农村插队的4.6万多名知青中，先后有44466人以招工、招生、参军、病退等形式离乡返城。到1980年底，除少数留在农场和在农村安家的外，昆明郊县区99%的知青都离开了农村。³

在1969~1979年的十年时间里，昆明与全国一样，一批又一批知青们满怀激情、热热闹闹地从城里去到农村，后来又一拨接一拨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农村，返回城市。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像大海边起落的潮水，哗啦啦地涨潮，又呼啦啦地退潮，最后几乎没有在海滩上留下什么痕迹。

二、我在呈贡插队的四年

“文革”期间，我1969~1971年读了两年初中，1971~1973年又读了两年高中，于1973年10月到昆明市呈贡县龙街公社小古城大队插队，算是所谓的“小知青”中最早的一批。

³ 据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后一批在晋宁县的43名昆明知青到1984年才离开农村，参加工作。

呈贡属于昆明近郊县区，从县城到昆明只有 20 多公里，条件相对好一些，是当时知青选择的热门插队地区。据有关资料，从 1972~1979 年，共有 6313 名昆明知青先后下到呈贡县，被安置在全县六个公社的 50 多个生产大队里。

我们这一批到小古城大队插队的共有九个知青，分为三个集体户安排在三个自然村（小古城村四人、西波村三人和麻莪村两人）。我和另外两个男知青、一个女知青组成了小古城村的第一个知青集体户。刚到队时没有地方住，生产队就把碾米房腾出来让我们临时安身，西波村的三个女知青则被安排在生产队的豆腐房。我们在碾米房、豆腐房一住就是两年多，后来才搬进了新建的知青房。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尤其是我们下乡的小古城大队，是呈贡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人口不算多，但土地面积大，山坡上有山地，村子周边有水田，而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农业机械，所有农活全靠人力，因此劳动强度很大。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几天，一年到头基本上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最辛苦的是春耕和秋收季节。春耕时的一项重活是用二齿（一种只有两个齿的耢耙）挖田，几天下来，手掌上满是血泡。还有就是往田里送肥料和送稻秧，要肩挑一百公斤左右的担子走一、两公里路。秋收时白天割谷（稻）子、挑谷子，晚饭后还要在场上加班打（脱）谷子，到半夜下工时人累得像瘫痪了一样。

对于当时不到 20 岁，过惯了城里生活的年青人来说，农村生活确实是一种挑战。我们不仅要承担高强度的劳动（与当地农民干完全一样的活），下工后冷锅冷灶，还要自己烧火做饭；而村民们家里有人，回家就有热饭吃。知青才到农村一无所有，既没有菜，更没有肉，常常就是一点咸菜下饭。而村民家有自留地可以种菜，可以养猪养鸡，因此吃

的也比知青好。从这一点来说，知青的生活比当地农民还要苦。

当然，由于土地多，一年辛苦下来，除了完成上交国家的公粮任务外，生产队也能剩下不少粮食，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生产队里还办了一个小铸造工厂，有一点副业收入。这样，小古城的十个工分（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值可以达到一块钱左右，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有的生产队十工分只合四、五角钱，甚至一、二角钱）。我记得，我下乡的第一年年终结算时，共有两千多工分（知青不能算壮劳力，每天只能有8~9分；而且也不可能全出勤），扣除粮食钱外，分得了160多块钱，在当时算是很可观的一笔钱了。

下乡第二年后，我们知青户也分到了自留地，开始种一些蔬菜，后来还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年底杀了猪做了一些咸肉，还学着腌了一些咸菜，生活有所改善，对农村生活也逐渐习惯了。村民们看到我们干活卖力，能吃苦耐劳，不会干的农活虚心向他们请教，因此大多数村民，无论年长的还是年青的，对我们都很友好，常常在劳动中和生活上给我们许多帮助。一些年轻人还成了我们知青的好朋友，直到多年后仍保持着联系和来往。

当时像小古城这样的坝区农村一个很大的困难是缺乏燃料，当地既没有煤也没有柴，村民们做饭主要靠烧麦秸和稻草。我们几个知青从书报上看到可以用沼气做燃料后，就在大队支部书记徐志的支持下试建了一个沼气池。当我们开始使用沼气时，村民们都来知青户看新鲜，看到居然能用猪粪牛粪加杂草产气煮饭、点灯时，无不啧啧称奇。此事经县上报道后，一时间全县各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由于当时我们设计的沼气池不够科学，输气管等材料的质量也不好，用了不到一年后就废弃了，但我们知青户毕竟是呈贡县最早开始尝试使用沼气的。直到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末，呈贡县（以及云南其它地方）才在政府的支持下在

农村推广普及沼气。

由于我们小古城大队知青集体户表现好，连续几年都被评为公社和县里的先进知青集体户，我本人也先后被评为县级和市级的先进知青，到县上和市里出席过先进知青代表会。我在中学时就已加入了共青团，下乡第二年后就担任了小古城大队的团支部书记，第三年又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小古城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徐志一心希望我长期留在农村（当时叫做“扎根农村”），多次动员我入党。但我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想在农村永远“扎根”，所以始终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徐支书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下乡时我从家里带来了一些书，主要是中学的数、理、化、历史、地理、英语等教科书和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们这批知青都还比较好学，当农闲或下雨不出工时，大家就在知青户里看书学习。“文革”期间中学上得很马虎，反而是在农村的几年里，我还自学了不少东西。当后来有机会考大学时，成绩居然还不错。我们后来把这种在农村仍然坚持文化知识学习称为“念早稻田大学”。

到1976年，与我同时下乡的八位知青都陆续参加招工、招生离开了农村，原来的集体户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甚至连那些比我晚一、两年下乡的知青也开始离乡返城了。当时我没有急于离开，一是因为当地徐志支书等农村干部的热情挽留，而自己也已适应了农村生活；更主要的是我不想直接参加工作，而是希望能进大学学习，毕业后再工作。就这样，一直到1977年底我通过考试被昆明工学院录取，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大学生后，才离开了小古城村。

19岁下乡，23岁离开，我在农村整整劳动和生活了四年。虽然后来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了大学老师，后来又多次出国进修、讲学、研究，但四年的农村知青生活在我生命中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年来，我不时会在梦中回到小古城村，也时常会回味那些虽然艰苦但却值得怀念的岁月，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知青情结”吧。

1993年和2008年，我们几个知青曾两次相约回到小古城探访。但发现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满眼都是陌生的景象了。当年我们住过的碾米房、豆腐房早已不复存在，到处都是村民们新盖起来的房子；连我们原来种过的自留地，现在也分给一户村民盖起了新楼房；村子里遇到的人大多数都不认识了；一打听，徐志支书、王举队长等当年的干部都已去世；找到当年熟悉的青年朋友家中，见到的也是一张张苍老而陌生的面孔……

三、40年后的评说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当年那些意气风发、充满青春活力的知青现在大都已年近花甲、两鬓斑白，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今天重提“知青”这一话题，除了会带来一些怀旧的伤感外，更多的应该是引起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毛泽东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般都认为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动机：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动机，让年轻人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改造社会、最终“消灭三大差别”；⁴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的动机，“文革”后期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必须尽快为他们找到出路，免得他们在城里“造反”添乱，“上山下乡”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也都有根据，但从毛泽东的思想和

⁴ “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性格来看，理想主义的色彩可能更浓厚一些。

在十年的时间里，将两千万年轻人从城市送到农村和边疆，这一运动波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我相信，今后也不可能再有。它确实是毛泽东一次空前绝后的超大规模社会实验！

然而，可悲的是，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实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上山下乡”运动既未能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也未能解决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轰轰烈烈的两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大潮，后来也退落得一千二净：不仅到农村插队的知青都走光了，那些去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也基本走光了。据说，邓小平在1978年就曾经说过：

“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可以说这就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盖棺定论。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可以这样来评价“知青运动”。但是，作为个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知青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又应该如何来看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呢？

知青中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⁵

一种是完全负面的看法，认为“上山下乡”坑害了一代人，耽误了这一代人的青春，使他们失去了上大学、出国、享受家庭温暖的机会，让他们吃了许多苦、遭了许多罪。还有的人甚至把“上山下乡”说成是一部“知青血泪史”、一场“噩梦”，认为知青下乡是遭受政治迫害、

⁵ 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同看法和评价，可参见定宜庄、刘小萌合著的《中国知青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以及凤凰网知青频道（<http://tieba.news.ifeng.com/zhiqing/>）的有关评论。

是“变相劳改”，下农村如同下地狱，青春被埋葬，是人生中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

作为一个下过乡、吃过苦的知青，我对这样的说法总是嗤之以鼻。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即使不下乡，城里的生活比农村也好不了多少，一样也要吃苦，更谈不上出国、上大学了。即便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并非人人都能上大学、出国。因此，不能把一切不幸和痛苦都归咎于“上山下乡”。那些不过才下了几年乡就对上山下乡运动喋喋不休进行“血泪控诉”的人应该想一想，当地的农民们终生在乡下劳作，种出粮食养活了城里人，难道他们就不是人，难道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该一辈子在农村吃苦受罪？

另一种看法则正好相反，热情歌颂、赞美“伟大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他们献身农村，献身边疆，为祖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知青们把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缩小了城乡差别；知青们在农村战天斗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们自己也在精神上接受了洗礼，思想得到了升华；因此，知青们付出的青春年华是值得的——“青春无悔”！

但我觉得，也不能把“上山下乡运动”看得那么美好，它毕竟是一种在特殊年代里的一种非常措施，是一种逆时代发展潮流的运动。正如前面所说的，知青下乡是毛泽东一次不成功的社会实验，也是他“文革”错误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理性、不正常的状态下，知青们能有多大的作为，知青运动又能“伟大”、“美好”到哪里去？

总之，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地来回顾这个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山下乡”是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它没有真

正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确实给一些家庭和个人留下了一些难以平复的创伤。但从知青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个运动中也并非一无所得。首先，上山下乡使我们认识了农村，了解了农民，看到了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在城市里和课堂上难以获得的人生营养。譬如，我们常说“吃过农村插队的苦，就再没有吃不了的苦”。⁶ 这难道不是一种宝贵的人生收获吗？

其次，上山下乡使我们这一代人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不畏艰苦、不甘沉沦、坚韧顽强、奋发进取的精神。尽管当时确实有少数知青由于看不到前途，在乡下消沉颓废，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但大多数知青是努力向上的，他们脚踏实地、辛勤劳动；他们努力学习、勤于思索；他们热爱生活、团结互助；他们与当地农民同甘共苦、友好相处；他们在前途迷茫时不自暴自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青精神”。

著名学者秦晖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否定“知青运动”并不等于否定“知青精神”。⁷ 虽然那场悲剧性的“知青运动”是失败的、是值得反思的，但是，那种与命运抗争、努力奋斗的“知青精神”却是值得弘扬的，甚至是应该歌颂的。

⁶ 用一些知青的话来说，就是“喝过了下乡这杯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⁷ 秦晖：〈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经济观察报》2012年7月6日（<http://www.eeo.com.cn/2012/0706/229541.shtml>）。